

類書

顧名思義，類書是先設定好幾十或上百個門類，將既有各書中與某門類相關的文句或段落節錄出來，將之匯集在一起。好比：假設有個門類是「梅」，編撰者就將他所見到的古書中所有關於梅的記載都從原書中抽出，依書本撰成的時間次序，置於「梅」那個門類中。

類書擷取的材料範圍，最常見的乃自然、人文各方面的材料俱在其內，如唐高祖命歐陽詢編撰的《藝文類聚》。也有少部份是針對某一主題蒐羅、排比材料的類書，如中唐初期劉賡編撰的《稽瑞》，就僅抄錄古書中吉祥徵兆方面的材料。因而其中節錄了不少讖、緯一類作品中的文字，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編撰《緯書集成》時，就曾利用到這本類書，以蒐輯讖、緯的佚文。

類書各門類編撰材料的方式，最常見的不外兩種：或者在節錄的各文句前就標舉書名或篇名；或者在節錄的文句後註明出處。註出處時，有詳有略。像虞世南在隋朝時編撰的《北堂書鈔》大多會在那個摘出的詞句之下，不但會註出書名，而且會節錄那個詞句原始出處的上下文，但有時僅註出書名。

以編撰材料的方式而言，北宋初，由南唐出仕北宋的吳淑《事類賦注》是一特例，也可謂精心之撰。他以一個字為每一門類的名稱，如〈天〉、〈舟〉、〈梨〉，將古書中屬於該門類的句子，串接成一篇賦。換言之，每一門類就是一篇詠物賦。無怪乎這本類書原名《一字題賦》。宋太宗命其再加註釋，吳淑於是在每句之下寫出原書名以及那句的上下文，這才改為現在這個名稱。

類書本身不具有獨特見解或思想，所以像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等將王溥的《唐會要》視為典章制度的資料彙編，因而歸在類書之下，還說得通，將杜佑的《通典》也納入，就不恰當了。同理，北宋真宗景德二年（1005），王欽若等奉敕編撰的《冊府元龜》能否算作類書，也可斟酌。這不僅是因為編撰《冊府元龜》時，不取雜史、別傳等以及大部分諸子書中與政治有關的論述，所謂「蓋欲垂為典法，異端、小說咸所不取」，而且每一部之前都有總序，每一部下面的每一門類之前又有小序，述其指歸，並非單純的資料彙編，與一般類書以多為上，以致薰蕕並收的狀況迥別。

類書不同於叢書。後者是將許多完整或殘缺的書籍集合在一起，然後冠在編者所取的名稱下，例如：《守山閣叢書》、《知不足齋叢書》、《金華叢書》、《漢魏叢書》。不但收入的此書與彼書之間沒有必然關係，書中的材料也沒有被打散、再分類彙整在一起。

類書也不同於書抄。後者是編者基於某一或某些觀點，將他認為重要古書中的重要部份抄錄下來。換言之，書抄等於是該編者心目中必讀書籍的節錄本，或者說簡要本。此書與彼書之間可能有某種浮泛的通性，好比唐初魏徵奉敕編撰的《群書治要》，既是為了汲取政治智慧、教訓而編撰的，所以選取的書籍與各

書當中的部份都必然與此有關。然而彼此之間也可能毫無關係，如唐中葉馬總編撰的《意林》，只是將他認為子書中某些好的句子摘錄出來，摘錄完了這本，再摘錄另一本。不論哪一種書抄，書抄中抄錄的某書篇章同樣沒有被打散、再分類彙整在一起。

類書的性質既然是工具書，也就可知：它固然絕對不是經書或子書，更與文學作品無干。換言之，它與傳統圖書劃分的各大部門各自的通性都不合。

劉向、歆父子整理中祕的時候，根本還沒有類書，不會出現後來《四庫提要》所說：「四部之內，乃無類可歸」的煩惱。曹魏初，一般認為的第一部類書《皇覽》見世。荀勗因為將它視為史料彙編，所以歸於《中經簿》中的丙（史）部。《隋志》將類書改置於子部雜家類之下，大概著眼於類書從各書中漁獵材料，但這犯了嚴重的形式主義謬誤，因為就像章學誠《文史通義·立言有本》所言，真正的雜家「雜於眾，不雜於己」，此所以雖「雜而成家」。意思是：雜家作品僅是選取既有書籍中的素材，來表達自己的思想。這與類書一無思想可言，相去不啻萬里。因此，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所本的毋甗《古今書錄》一改前轍，雖然仍將類書放在子部，但已經從雜家類中獨立出來，另成立一子目：「類事家」。這種作法成為此後類書在圖書歸類中的主流。

鄭樵《通志·略·藝文略》將圖書分為十二類，將類書由類下的一家升格為與經類、史類、諸子類等並列的類書類，雖然頗為合理，可惜鄭氏的觀點與作法在學界並沒有成為主流。

編撰類書的目的大致不外以下幾項：

皇帝為了顯示天下已昇平，自己乃右文之主，都會編些大部頭的書籍，類書即其中的一種選項。例如北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（976-984），命李昉等人編了三部大書：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文苑英華》。其中的《太平御覽》即是類書（《太平廣記》、《文苑英華》只能劃歸為總集）。明成祖於永樂元年（1403）命人編撰、永樂六年竣工（1408）、篇幅乃歷代以來最龐大（正文高達 22877 卷，目錄 60 卷）的《永樂大典》更是這方面的代表。

某些朝代的某些諸侯王為了培植羽翼，或者快速掌握一般知識，也會讓他的僚屬編類書。如梁武帝之弟、安成康王蕭秀就命其戶曹參軍、注《世說新語》的劉孝標（名峻，孝標乃字，但以字行）編撰《類苑》；唐太宗之子、蔣王李暉命其僚佐杜嗣先編撰《兔園冊府》（《郡齋讀書志》卷十四曾誤以為這本類書乃虞世南撰，今因敦煌殘卷的發現，知晁說非是）。

士人自己編撰，或為了平時寫作詩、文時，對仗、用典便利，如唐白居易的《白氏六帖》（兩宋之際，孔傳編撰《六帖新書》，南宋末，白氏、孔氏這兩本書被合為《唐宋白孔六帖》，簡稱《白孔六帖》）；或為了與上司、友僚討論時便於查核，如北宋晏殊的《類要》；或為了希望通過科舉考試的嚴格要求，如南宋王應麟的《玉海》。這均源於古書浩瀚，一個學人縱使再博聞強記，也不可能始終不或忘。

書商編撰，但對象是社會大眾，讓一般人家中都可擁有一查閱方便的小型資料庫，以便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困惑。如明代中葉余象斗編撰的《萬用正宗不求人》。

在編撰目的這樣的脈絡下，就可以進一步釐清上文已經談過類書當如何界定的課題——

據劉肅《大唐新語》卷九的記載，唐玄宗命徐堅等編撰《初學記》，編撰的目的不是為了潤色鴻業，也非像王應麟等士子為了科舉，而是因為「兒子等欲學綴文」，「務取省便，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」。可是起意者是父皇，並非那些皇子本身，又與唐末、五代鄉里塾師最喜歡使用的《兔園冊府》不同。雖然有這些特點，《初學記》仍然毫無疑問是類書。

然而同屬盛唐時期李瀚編撰且註釋的《蒙求》則不當視為類書。他在書末講明編撰此書的原因是：「浩浩萬古，不可備甄，芟繁摭華，爾曹勉之」，所以每四字一句，講一個典故；每兩句對仗，形成一聯，但上聯與下聯既非同類，也看不出有任何邏輯上的關連。例如「晉宣狼顧；漢祖龍顏」，講的是君主天生異表，與下一聯「鮑靚記井；羊祜識環」，講前世記憶猶在，彼此根本不同類。兩聯排在一起，純粹是因為編者為了讓學童便於記憶、背誦，採取押韻的方式編排。既要押韻，兩句一韻，勢必至少四句兩聯，才能構成一單位。

明末程登吉（字允昇）編撰的《幼學須知》，確實是分為天文、地輿等三十二類，以駢文的方式，將同屬這一類的內容組合在一起。如〈天文〉：「日為眾陽之宗；月乃太陰之象，虹名蜺蝥，乃天地之淫氣；月裡蟾蜍，是月魄之精光」，與上述李淑最初編撰的《一字題賦》非常相似。然而由於沒有在每句之下註出原文，不能算類書。經由清初鄒聖脈增補並註釋，並改名的《幼學故事瓊林》則可以算類書了。

簡言之，類書必須分「類」，各類之下摘錄古籍中的文或事必須是同屬於這一類的，並且要標舉或註出那些文或事的出處，缺一不可。

一般都認為第一部類書乃曹丕命王象、劉劭等編撰的《皇覽》（皇，大也；覽，觀也。《三國志·文帝紀》說：「凡千餘篇」，〈楊俊傳〉裴注所引《魏略》說：「八百餘萬字」。據《隋志》，蕭梁時期見到的尚有六百八十卷）。事實上，《皇覽》裡有許多編者的考訂意見，並非純粹的類書。在曹丕心目中，它乃是一本足以與秦之《呂覽》、漢之《淮南》鼎足而三的巨構，甚至凌駕二者之上。按嚴格的類書界定，以見知史料而言，第一部類書是上文所說劉孝標的《類苑》。梁武帝為了與之爭勝，命徐勉等人編撰了《華林遍略》。這本類書流傳至北方後，高齊後主命人添加了北方才見得到的少數書籍中的材料，如崔鴻的《十六國春秋》、魏收的《魏書》等，撰成《修文殿御覽》（敦煌有個類書抄本的殘卷，羅振玉認為是《修文殿御覽》，但學界名宿洪業考證，它們恐怕是《華林遍略》，至少絕對是南朝編撰的類書）。隋、唐已降，編撰類書才漸盛。

然而歷代以來編撰的類書後來大多或殘或亡，根本原因在：從質的角度講，

許多類書都是抄襲既有的類書，再多加點材料，並非編撰者從原書中一點點耙梳出來，沒有什麼別出心裁之處。從量的角度講，類書既然以多為上，先編撰完成者能利用到的材料經常會不及後編撰者，很容易被後者取代。當然，卷帙過份龐大，如《皇覽》、《永樂大典》等，因為抄寫、刻印不易，資本、售價太高，反而會導致它們流傳不廣，終至散亡的命運。

編撰類書的目的雖然不外上述四點，但隨著時代、學術演變，類書衍生出新的功能。

由於先唐的書籍散亡嚴重，北宋已經開始了輯佚的工作，但當時還沒有利用到類書，例如北宋黃伯思見到的《相鶴經》是從《意林》、《文選》善《注》中輯得。南宋王應麟輯齊、魯、韓三家《詩》說，撰成《詩考》時，雖已用到類書，但主要還是靠唐代《五經正義》、《經典釋文》等經學作品。輯佚這項文獻學工作達到顛峰，乃清代的事。當清代學人驚覺：連《水經注》、《舊五代史》、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等那麼要緊、卻已經不見於世的書籍，居然都可以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，激勵了他們紛紛投入輯佚的工程中，並且大規模地利用類書，從中取材。這就使得原本性質即為資料庫的類書成為瑰寶。

任何一本古書傳抄、刻印愈久，錯誤容易愈多。雖然古本不一定是善本，但不容否認，從一般狀況來說，早先那些類書的編撰者當時見到的古籍可能較接近它們的原貌，至少與既有古書比對，發現有異文時，也可以予人省思的角度。這就使得全力從事古籍整理、註釋的清代學者利用類書徵引的某書字句，來校訂目前坊間那本書的字句。

清代學者既大規模利用類書，沒多久就意識到一項重要前提：如果所用某類書的抄本或版本甚差，根據它來校訂現有古籍，只會愈校愈錯，把沒有錯的誤當成錯的。例如：明代坊間通行的《北堂書抄》是陳禹謨的刻印本、《初學記》是安國（號桂坡）的刻印本，妄補妄改的情形頗嚴重。因此，進一步開啟了搜求類書善本、校刊類書的工程。

經由清代至近現代學者的努力，現代一般所說的四大類書（清人所說的四大類書包括《冊府元龜》，無《初學記》）已經有了比較優良的善本或校訂本：

虞世南《北堂書鈔》，以孔廣陶校訂的最好。

歐陽詢《藝文類聚》，以汪紹楹校訂的最好。

徐堅《初學記》，以古香齋的巾箱本最好。

李昉《太平御覽》，以日本仿宋刊本較好。